

罗振玉、王国维与日本书法家山本竟山交游考

——以新发现的信笺资料为中心*

□ 苏 浩

摘要: 罗振玉与王国维寓居日本京都时,与著名的文人书家山本竟山开展了一段文人交谊,特别是1913年罗振玉与王国维协助山本竟山举办了影响较大的和汉法书展览会。本文通过解读新发现的罗振玉写给山本竟山的三封信以及王国维为山本竟山修改润色跋文等信笺资料,对罗振玉、王国维与山本竟山之间的交游进行个案考察,并由此关注书法在近代日本汉学细分化中的轨迹。

关键词: 罗振玉 王国维 山本竟山 信笺 和汉法书展览会

中图分类号: K250.6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20.03.016

引 言

以往关于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与日本人士交流的研究,除关注上海东文学社时期和罗振玉的两次日本考察外^①,多以他们在京都时期与日本文人、京都学派学者的交流为中心进行研究^②。2018年4—5月,日本关西大学举行“山本竟山的书法与学问”特别展览会,笔者作为实施委员会的成员,以此契机在山本竟山(Yamamoto Kyozan, 1863—1934)后人家中发现并拍摄了罗振玉、王国维与山本竟山交流的书信资料,其中关于和汉法书展览会的内容值得关注。山本竟山是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

人书家,也是金石学、古碑法帖的大家,在关西地区尤负盛名。1913年12月4日,山本竟山于京都府立图书馆举行了和汉法书展览会,展出众多中日名家的书法作品,此次展览会成为日本大正时期著名的翰墨盛事。其中107件名品制成法帖,即《和汉法书展览会纪念帖》委托近代日本最有名的精印出版机构——油谷博文堂,采用珂罗版印刷法于1914年2月出版。

一、山本竟山与中国书法的渊源

山本竟山,名由定、繇定,号竟山,日本岐阜人。山本竟山“余清斋”的斋号便取自董其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课题(项目编号:20ZDDYYS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① 钱鸥:《罗振玉、王国维与明治日本学界的际会——以〈农学报〉、东文学社时期为中心》,《中国文学报》1997年总第55期,第84—126页;修斌、陈琳琳:《王国维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以藤田丰八、田冈云岭、桑木严翼为中心》,《环东亚研究中心年报》2009年第4期,第139—145页;菅野智明(Kanno Chiaki):《罗振玉与明治末叶的东京》,《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2016年总第74卷,第80—92页;菅野智明:《从〈扶桑再游记〉看罗振玉与日本人的交往》,《书学书道史研究》2017年总第27期,第1—16页。

② 杉村邦彦(Sugimura Kunihiko):《罗振玉的“文字之福”与“文字之厄”:京都客寓时代的学问·生活·交友·书法》,《书论》2001年总第32号,第105—125页;谢崇宁:《罗振玉与日本汉学界之关系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第92—98页;藤田高夫:《林泰辅与王国维:出土史料研究黎明期的中日学术交流》,《亚洲文化交流研究》2009年第4期,第73—79页;修斌、陈琳琳:《王国维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东亚:历史与文化》2010年总第19期,第1—15页;谢崇宁:《王国维的治学与日本汉学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83—90页;苏浩:《罗振玉与山本竟山的文人交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020年总第53辑,第251—265页。

昌(1555—1636)在名帖《余清斋帖》上的题字。山本竟山著有《竟山学古》《金曜会墨林》《云峰山观海诗》等。15岁时,山本竟山师学书法于岐阜书法家神谷简斋(Kamiya Kansai, 1823—1904);17岁时师学汉学于岐阜汉学家小林长平(Kobayashi Tyohei, 1834—1914);18岁时师学书法于寓居日本的苏州文人王鹤笙;20岁时师学金石文字于寓居日本的嘉兴文人陈曼寿(?—1884);26岁时,拜师于有着近代日本“书圣”之称的日下部鸣鹤(Kusakabe Meikaku, 1838—1922)。山本竟山曾在与罗振玉的笔谈中提到自己有“金石癖”,曾七次(1902—1930)赴中国探访书学源流,并拜金石学家杨守敬(1839—1915)为师,收集各类金石碑板法帖^①,如其所购得的《皇甫诞碑丞然本》《宋拓争位帖》《余清斋帖》等不少都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法帖,对日本书法和鉴藏界亦产生重要影响。山本竟山也结识了许多中国文人名士,除本文讨论的罗振玉、王国维外,与俞樾(1821—1907)、吴昌硕^②(1844—1927)、康有为(1858—1927)、端方(1861—1911)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1904—1912年,山本竟山担任日据中国台湾“总督府”的“秘书课嘱托”一职,负责日据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化事业,包括书画教育的普及、书学振兴以及碑碣挥毫等工作。1912年11月,山本竟山从中国台北解任回到京都后,受聘于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书法。山本竟山书学造诣极高,尤其碑学成就颇丰,曾担任泰东书道会、日本美术协会等日本不少主流书道会的评审或审查长,为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 1835—1901)等不少名人撰文写碑。他曾数十次为京都大学校长及京都和神户市长代笔上书天皇,书法深受皇家喜爱,日本宫内厅也有

收藏。山本竟山还为日本数十处著名的文化遗产题碑,如“日本三景”之一的“天桥立”石碑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天龙寺”石碑等。另外,山本竟山还是一位书法教育家,其教育规模在当时关西最大。据山本竟山后人统计,约有一万多人曾跟随山本竟山学习,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物理获得者汤川秀树(Yukawa Hideki, 1907—1981)也是他书法直系弟子之一。

1913年4月,作为发起人之一,山本竟山协助内藤湖南(Naito Konan, 1866—1934)举办了大正癸丑京都兰亭会。^③除展出自藏品外,山本竟山托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日本汉学家长尾雨山(Nagao Uzan, 1864—1942)^④前往绍兴取得王羲之牌位的拓片及兰亭清水(装于12支啤酒瓶内)一并邮寄到京都。他在修禊的祭坛上安设了“晋右军将军王公逸少谥羲之神位”拓片,并供奉了兰亭水和以此制成的点茶,颇有身临其境之感,可谓匠心独运。大正癸丑京都兰亭会揭开了日本大正时期翰墨雅会的序章,同年同地举行的和汉法书展览会也被视为兰亭会的余韵。

二、罗振玉、王国维与山本竟山的交往

山本竟山与罗振玉、王国维的相识要从他的两位恩师——日下部鸣鹤和杨守敬说起。1880年,杨守敬受首位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邀请赴日,在公使馆从事文字工作;第二年作为第二期公使黎庶昌(1837—1897)的随员留任。在东京期间,杨守敬与日下部鸣鹤深入交流,展示携带的一万多件汉魏六朝及隋唐时期的碑板法帖,极大促进了北朝书法在日传播,给日本书法带来巨变。直到1884年杨守敬回国在湖北担任教谕这段时期,山本竟山还居住在家乡岐阜并未

① 关于杨守敬与山本竟山的师承研究,详见笔者拙文《近代中日书法交流的一个侧面:以杨守敬与山本竟山为例》,《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2020年总第41号,第67—86页。

② 关于吴昌硕与山本竟山的交游考,详见笔者拙文《吴昌硕与山本竟山交游略谈》,《中国书法》2019年第24期,第124—127页。

③ 1913年时值日本大正二年。不仅在京都,杭州和东京也举行了盛大的兰亭会,北京和上海举行了小规模兰亭会。京都兰亭会首倡者有28人。根据内藤湖南拟定的《兰亭会缘起及章程》,盛会分为展览会和修禊两部分。4月12—13日的展览会在京都府立图书馆举行,展出了与王羲之、兰亭会相关的中日两国书画、印谱、法帖等,13日的修禊在南禅寺内进行。

④ 山本竟山与长尾雨山就京都兰亭会筹办的往来书札现藏于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详情可参见陶德民:《大正癸丑京都兰亭会的怀古与继承——以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收藏为中心》,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3年,第118页。

曾与杨守敬谋面。1888年,山本竟山拜日下部鸣鹤门下,开启了山本竟山书法的碑学时代。在日下部鸣鹤的推荐下,1902年3月山本竟山首次游学中国,收集碑板法帖并拜访杨守敬。因为杨守敬与罗振玉熟识,据日本史学家杉村邦彦的研究,山本竟山在日下部的推荐下,到中国先去拜访罗振玉,后罗振玉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杨守敬,为山本竟山中国之行提供了便利和指引。^①笔者在山本竟山后人家中,发现了一页罗振玉与山本竟山的笔谈信笺,结合罗振玉的《扶桑两月记》,可以确定山本竟山在临近出发前的1902年2月中旬,与罗振玉在京都首次会面,推测应是日下部鸣鹤的介绍。^②

此外,拜访罗振玉也促成了山本竟山在中国的“出道”。罗振玉早在1901年于友人刘鹗(1857—1909)处得见殷卜骨墨本,并敦促刘鹗将这些甲骨文拓本编纂成书,即第一部甲骨文辑著《铁云藏龟》(六册),并于1903年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原刊本有罗振玉的序文和刘鹗的“自序”,而《铁云藏龟》封面及扉页书名的题字均出自山本竟山之手。罗振玉1904年出版的第一部系统讨论古陶文的辑著《铁云藏陶》(四册)的题字,也出自山本竟山之手并有其落款和钤印。近代中国知名学者的辑录请日本书家题写书名实属罕见,反过来中国文人给日人著作的题签倒不少。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研究推测,1902年山本竟山首次中国游学,经罗振玉介绍为刘鹗题字。^③可见罗振玉对山本竟山的书学造诣十分赏识,山本竟山也成为最早目睹甲骨片的外国人之一,促使他进一步钻研金石书法。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不愿出仕民国新政府,带全家避难日本京都(先至神户暂居后到京都)。与罗振玉既是师生,又是学友的王國維亦携家人同往。二人比邻而居,专注金石学、甲骨文等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罗振玉和王國維在日本分别度过了近八年和五年的遗老遗民生活,开启了与山本竟山的书学之缘。入住京都后,为了筹集大家族的生活费用和开展研究出版,

罗振玉不得不大量变卖携带来的文物书画。与此同时,他时常与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和长尾雨山为大量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做鉴定,书写题签和题跋,与各界人士形成了文人交流网。对山本竟山来说,这样一位深谙金石学和书法学问的资深中国文化人的出现,无疑是近水楼台的老师。罗振玉亦将王國維介绍给山本竟山认识,并在与山本竟山的书信和笔谈中数次提及王國維,与王國維的往来书信中也言及山本竟山。^④他还保留着王國維给他的名片。

三、罗振玉写给山本竟山的三封信

罗振玉尚未避居日本之前,已与日人有过不少交往。他与蒋伯斧(1866—1911)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社中设有“农报馆”,并创办了《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1898年,罗振玉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王國維便是他的学生。1901年底,罗振玉奉两江、湖广两督(刘坤一、张之洞)之命,率团前往日本考察教育、财政等制度;走访东京、京都等多地,写成考察纪行文《扶桑两月记》。1909年5月,罗振玉又以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身份赴日本考察农学,走访京都、北海道、东京等地一个半月左右,著成《再游扶桑记》。上海的经历和两次日本考察经历使罗振玉切实感受到当时日本的文明与强盛,对避难于日本有着直接的助推力。作为甲骨金石学第一人,罗振玉在日八年专注学术,并有大量的金石研究著述问世,其中代表性著述有《六朝墓志菁英》《石鼓文考释》《墨林星凤》等。

1911年底,罗振玉从北京抵达日本;1912年底,山本竟山从中国台湾回到日本,第二年着手准备和汉法书展览会。山本竟山嫡孙收藏的原本《和汉法书展览会纪念帖》封面为山本竟山题字,扉页的“书苑众芳”为罗振玉的题字,意为通过和汉法书展览会“游书苑而摘众芳”,即可“一览众山小”。关于大会作品筹备方面,现存罗振玉致

① 杉村邦彦:《潘存临郑文公下碑的传来及其历史意义》,见《墨林谈丛》,京都:柳原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② 详见笔者拙文《罗振玉与山本竟山的文人交流》,第254页。笔谈内容为“山本:京都不乏名所旧迹,恨先生滞留日甚短,不能陪普游。罗:弟本意在此滞留十日或一周间,然此次刘督军即须入觐,促归商学校事,故不能如愿,甚歉甚歉。”

③ 陶德民:《山本竟山的中国登场与清末金石学》,见《山本竟山的书法与学问》,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8年,第11页。

④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國維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山本竟山三封书信^①，兹录如下：

信一：(信封) 市内室町下长者町北 山本竟山殿 台展(邮戳) 2年(按：1913) 11月10日，正文如下：

竟山先生阁下。久别至念，前承辱候。值弟赴奈良，昨夕弟趋谒，则公又赴大坂，彼此想念，至怅至怅。留呈之件，想已察察矣。闻先生将开和汉法书真迹展览会，想必有剧迹可观。若需，意愿陈献藏品，则尚有数十家可供选择。但宋元人有限，近三百年间书迹为多耳。会地在何所，展览几日，便祈示。及大会接有求书之跋尾，书法精绝已佩已佩。昨夕携乃敝藏《魏百峰山诗》拓本，愿与公共赏。弟以为此北朝传世石刻第一，恨拓本不可得耳。况未得见，乃挟之而返，异日再奉请益。此祈道安。弟振玉再拜十月十三日。

在得知山本竟山将举办展览会后，罗振玉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藏品以供备选，并告知山本竟山宋元时期的收藏有限，大部分以清代居多，又询问会场与会期。从“及大会接有求书之跋尾，书法精绝已佩已佩”一句可以看出山本竟山在去信中拜求题字之事，罗振玉谦虚并客气地回应说山本竟山本人的书法已足够精妙，最后还希望展出自己珍藏的北魏郑道昭(?—516)《百峰山诗》的刻石拓片。

信二：(信封) 市内室町下长者町北 山本竟山殿 台 启 罗舛言(邮戳) 2年(按：1913) 11月18日，正文如下：

拜启。前得惠电敬悉。清游沮雨，弟又适患伤风，故未护趋前，为怅。大会想已着手，弟处出品目外写呈，祈赐收。届时祈鉴别，而后出陈何如。目中别列皆以专门书家为准，其学者名头名传，不以书名居，不加入庶，不倍大会之当初。此上。竟山先生侍史弟振玉再拜 廿夕。

信三：(信封) 山本竟山先生道启，正文如下：

宋：《朱文公书册》《宋孝宗书册》；元：

《饶醉樵书卷》；明：《沈民则书卷》《姚云东诗册》《戚南垞诗卷》《张子侍诗轴》《董文敏楷书轴》《虎卧老人隶书轴》；清：《杨大瓢书册》《姜西溟小楷册》《陈世南临董书册》《汪退谷临圣教序册》《金冬心分书轴》《姚姬传行书册》《戚亲王书轴》《禧秋之篆书册》《伊秉卿行书卷》《宋阙临楷书轴》《秣某庵临黄庭册》《阮文达行书轴》《严秋桥行书屏》《陈曼生三对》《汪竹坪书卷》《沈南瓶孝经卷》《黄小松小楷册》《何子贞药王庙书册》又《临汉阡册》《包安吴临书普册》《吴让之楷书屏》，又《分大屏》《莫子偲篆书屏》《赵岚伯写惠超传》《沈子培书札》，共三十四件，宸翰楼^②出品。又，《阮芸台书卷》《蒋小节书轴》《吴清仰对》。

据《和汉法书展会纪念帖》的记载，以“清国罗叔言君”为收藏出处的有14件，分别为：《宋朱文公书册》《宋孝宗书赞册》《元饶醉樵介蕉池积雪诗卷》《元顾善夫信经卷》《元赵子昂夫人管仲姬条幅》《明姚云东公绶册》《明沈民则度卷》《明董玄宰其昌堂幅》《明虎卧老人堂幅》《清汪秋泉士铉临圣教册》《清姚姬传蒲册》《清黄小松易册》《清吴让之廷彪四屏幅》《清何子贞绍基册〈临汉张迁碑〉/临汉〈石门颂〉》。除《元顾善夫信经卷》《元赵子昂夫人管仲姬条幅》两件外，其余全部来自展出备选品目。第二封信中，临近和汉法书会开幕，罗振玉请山本竟山对提供的展品甄别严选，并对品目加以说明：品目所列以“专门书家”为准，即按照作者的书法名气选择，“其学者名头名传，不以书名居”这一句更为具体。即使是名头很大的文人学者作品，如果书法名气不佳，也不会罗列在内。“不倍大会之当初”，为的是不违背展览书法名作的初衷，也侧面说明了山本竟山所定的筛选原则及大会规格之高。罗振玉展出的具体数目无法考证，但根据《和汉法书展会纪念帖》中的展品计算，他是展出最多的收藏者，部分藏品年代也是最早的，为整个和汉法书展览会增色不少。据1918年罗振玉编成的《宸

① 本文所有信笺内容辑录与释读由笔者完成，鉴其草字众多，笔者能力有限，录入文字谬误之处，祈请读者批评指正。

② “宸翰楼”是罗振玉在京都的藏书楼名。1918年罗振玉编成《宸翰楼所藏书画录》，2013年被编入《雪堂藏古器物目录(外五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翰楼所藏书画录》记录, 避难京都后相继卖出和转让大量所携书画后, 当时还藏有各种书画千余件, 其中也有不少源自日后在中国物色进而购得, 足可见其收藏之丰。

四、王国维为山本竟山修改润色跋文

王国维^①, 家学渊源深厚, 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 父辈精于篆刻书画诗文, 对王国维影响深远。1898年开始在离家不远的上海报馆《时务报》从事书记员工作, 并在罗振玉的东学社学习日语和科学等, 从而结识了罗振玉并受到赏识。1901年, 25岁的王国维得到了罗振玉的资助初次赴日, 经东文学社的另一位创立者藤田丰八(Fujita Toyohachi, 1869—1929)的介绍, 2月9日从上海东渡日本, 进入东京物理学校(现东京理科大学)就读; 翌年夏天因脚气病回国, 由理转文开启了哲学、文学等研究。王国维寄寓京都, 在罗振玉的帮助下, 专心致志研究文史哲等方面学问, 学贯中西, 著述极丰。

山本竟山为《和汉法书展览会纪念帖》的出版作了后记跋文。虽然少年起开始学习汉文, 但他还是对自己的汉文水平有些不自信, 亦是为了追求完美, 于是求教于王国维。现只存有王国维的书信, 山本竟山拜教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就目前所知, 王国维给日本人修文改章的记录还属首例。山本竟山将所写汉文寄给王国维委托修改, 王国维在原稿上做了增删后寄回给他。竟山又将改稿一丝不苟地誊写一遍, 并把王国维修改的部分用朱笔书写, 再补充上致谢人名, 后用小楷书写并题款和钤印成为正式的跋文。现将山本竟山原跋、王国维致山本竟山书信以及修改后的跋文兹录于下。

竟山原跋, 边文:

请削正, 由定拜。予自少有书画癖, 常思中外名家作品陈列一堂对照赏鉴也, 久矣。偶遇第七回文部省美术展览会开于冈崎, 因假其邻馆于府立图书馆当和汉法书展览会开设。收藏家诸子名品陈列多至数百件, 固望外之幸矣。今以名品归之各家, 千里相隔后

会难期。因择当世罕见者并予所喜者九十件, 写照付珂璃板厘成一帖以为斯会纪念。予浅学寡闻且乏鉴识, 故取舍失当必有之, 各家请勿咎之。而斯会之设实赖罗叔言翁、内藤诸君子之赞助, 聊付记于此时。

王国维致山本竟山的信:(信封)市内室町下长者町北山本竟山殿台启(邮戳)3年(1914)1月18日, 正文如下:

手教敬悉。大稿妄加笔削, 并将执事设法书会苦心加入数语, 不知肖当否。请查收为荷。此上。竟山先生侍史 国维顿首。

经王国维修改的跋文:

(边文)请削正, 由定拜。(正文)予自少有书癖, 思遍览中外古今名迹, 而每苦于不能至不能见, 即能致之能见之矣, 而不获萃于一堂, 以参互其得失, 推寻其源流, 亦未定收多见之益也, 平生尝抱此憾, 知海内君子之与予同憾者当不少也。癸丑之冬适文部省开美术展览会于京都冈崎町, 因假其邻府立图书馆设和汉法书展览会。海内收藏家闻予此举群相赞助, 名品麇至多数百件, 固意外之幸矣。今当各归本主, 虑此会之不可常而名迹之不易再聚也, 因择当世罕见者并予所尤嗜者百余件, 写照付玻璃板厘成一帖以为斯会纪念。予浅学寡闻且乏鉴识, 取舍失当自知不免, 然会中刷迹固已十得五六, 而书法之源流得失或已略具于此, 大方之家幸垂教之。斯会之设得罗叔言翁、内藤诸君子之助为多, 付记于此。

原跋首句“常思中外名家作品陈列一堂对照赏鉴也, 久矣”, 山本竟山虽表达了举办展览会的初衷和夙愿, 但行文平淡, 难引共鸣。正如王国维信中所记“将执事设法书会苦心加入数语”, 在文中增添了山本竟山举办盛会良苦用心的语句, 突出了展览会的意义所在——平众人之憾。关于《和汉法书展览会纪念帖》的出版, “取舍失当自知不免, 然会中刷迹固已十得五六, 而书法之源流得失或已略具于此, 大方之家幸垂教之”, 用语委婉谨慎而谦虚, 一改原跋“予浅学寡闻且乏鉴

① 王国维, 字伯隅、静安, 号观堂、永观, 浙江海宁人。王国维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显著, 乃民国时期的学术巨擘。

识,故取舍失当必有之,各家请勿咎之”的直接生硬的表达,突显山本竟山甄选出版纪念帖的水准和意图。实际上山本竟山的原跋也展现出相当的汉文实力,虽几乎没有日本人的“和臭”,但总免不了有些生硬的“和习”。经过王国维的修改润色后,平添不少神韵,用寥寥数语画龙点睛,引人共鸣与感慨。

结 语

传统日本汉学是指对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学问,并用汉语书写成果。汉诗文和书法等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日本文人的必修课,因此书法也被视作日本汉学的基本表达形态之一。“明治维新”这场深刻的政治制度变革不仅使日本慕化西方,而且也使学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自觉的同时开始把中国作为“他者”来研究。国学和西学渐盛而汉学式微,并形成了日本近代的“中国学”,即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以“东京史学派”(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学派”(京都帝国大学)为中心,包括部分其他人士的中国研究。京都学派的学术特征是“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治学原则和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①,即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依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和理解中国,将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共同构成中国学。随着研究的细分化,书法属于中国史学下的一门学问,而不是以前“经学主义”下主要承担文人修养的载体。研究中国的学者可以不擅长书法,书法家也不一定是传统的学问家。正如前文所述,和汉法书会的展品“以专门书家为准”,并不以学者名气为选择标准,这也印证了这一点。明治时期,随着西学的盛行和汉学塾的停办,书法进入衰落期,并被排除在政府的美术展和展览会之外,西洋画和浮世绘及工艺美术盛极一时。^②

钱婉约认为近代日本中国学家的中国研究,

一方面是基于个人学养进行书斋研究的职业行为;另一方面,无论从研究者主观理念还是研究成果的客观效果上看,都折射出中日两国的时代思潮,进而与当时两国的现实关系等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③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后掀起留学日本的高潮,王国维也是当时的留日一员。清末中国人通过译介日语版的西方书籍和明治日本人的著述,开展思想革新和“新文化运动”,并且大量日本人教习和顾问在华从事清末近代化各项事业。两国有着相对宽松的文人交流渠道。山本竟山多达七次的中国游学即为印证。

山本竟山虽然受聘于京都帝国大学担任特聘书法教授,但并不属于京都学派,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而是一位书法家和书法研究者,可以说是京都学派的周边人物。山本竟山与许多京都学派的学者保持密切的交流,并得到内藤湖南在内诸多汉学家的大力支持,为了复兴日益衰落的书法文化,定期举办书学研究沙龙——平安同好会(1913),钻研中国的金石篆刻与书法。平安同好会后来发展为平安书道会(1919),京都大学校长担任会长,山本竟山与内藤湖南作为顾问,致力于日本近代书法学的发展与革新。1915年1月19日,77岁的杨守敬溘然长逝,山本竟山为了缅怀恩师,于2月6—7日在京都冈崎府立图书馆(与法书会同一场所)筹办了杨守敬追悼活动,包括书法展观和纪念演讲会,罗振玉再次协助山本竟山——他也是唯一的中国协办人。一方面,对罗振玉和王国维来说,和汉法书展览会的举办是令人欣喜的,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续存,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不该全盘西化,这一点与山本竟山有共识;另一方面,山本竟山对金石法帖真迹的收藏和对书法本源契而不舍的研究,与罗振玉的金石研究和王国维的实证主义理论相得益彰。罗振玉和王国维在回国后依然与山本竟山保持联系,并留下数封碑板法帖和书学讨论的书信和笔谈,三人的交流也构成了近代中日文人网的一部分。

(苏浩: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①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2页。

② 苏浩:《为什么在近代日本“书法不是美术”?——官方美术展中书法与美术的乖离》,《东亚文化交涉研究》2018年总第11号,第319—336页。

③ 钱婉约:《汉学家的周边——以日本中国学家与晚清民国为例》,《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第125页。

The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y of Iceland was introduced comprehensively and in detail by Wang Xianqian in his book *Wuzhou Dili Zhilüe* in 1910. Many modern geographical books introduced the volcanoes of Iceland, of which *Wuzhou Dili Zhilüe* was in most detail. The accounts of the Hekla, the famous volcano in Iceland and the Öraefajökull, the highest one, were also verified.

Key words: Iceland, geography, volcano, *Wuzhou Dili Zhilüe*, *Haiguo Tuzhi*

The Literati Friendship of Luo Zhenyu, Wang Guowei and the Japanese Calligrapher Yamamoto Kyozan: Based on Newly-Discovered Letters

Su Hao

Abstract: When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lived in Kyoto, Japan, they had a literati friendship with the famous literati calligrapher, Yamamoto Kyozan. In particular,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assisted Yamamoto Kyozan to hold the influential Wakan Calligraphy Exhibition in 1913. By interpreting Luo Zhenyu's three letters to Yamamoto Kyozan and Wang Guowei's proofreading of the preface for the Exhibition,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s friendship with Yamamoto Kyozan,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as a subdivision of modern Japanese sinology.

Key words: Luo Zhenyu, Wang Guowei, Yamamoto Kyozan, letters, Wakan Calligraphy Exhibition

Commercial Theatre and Remembrance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ravelogues of Yan*

Ren Ting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rprets *Travelogues of Y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sorts out the accounts of Chinese theater in *Travelogues of Yan*, in which the Korean emissaries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ge and commercial drama,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evalu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actors in the local Chinese accounts.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Korean dynasties' acceptanc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opera as it was being disseminated in Asia name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literary ideas and its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Travelogues of Yan* show resentment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and nostalgia for the Ming dynasty.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depart from the long-term Western perspective, to reflect on the drama from an Asian perspective, and to look a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surrounding nations, showing the spread of Chinese opera in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Travelogues of Yan*, drama stage, performance of drama, dissemination of drama, the perio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From Missionary Sinology to "Neo-Sinology"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panish Sinology

Guan Yongqian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panish sinology from the mid-16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nd reviews important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panish sinology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sinologists of various periods as defining factors.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Spanish sinology presents different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methods, and has been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missionary sinology to